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



伟大事业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自觉能动性、摆脱盲目性，推动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其深刻的洞察力、鲜明的实践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给予我们方向指引，让我们明确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这是对我们党百余年来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革命时期，面对一些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我国大大落后于时代脚步之时，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大踏步赶上时代。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始终坚持正确前进方向、葆有昂扬奋进动力，在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

以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明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道路的政治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任何时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这些都是事关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只有以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明方向，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保持独立自主走自己路的坚定意志和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决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一系列重要要求，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理论的清醒坚定确保目标不变、方向不偏。

以理论上的守正创新明方向。实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理论上的守正创新为我们实践中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不断回答中，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建设提供明确方向和路径、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跟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在实践中大胆探索。

以理论上的高瞻远瞩明方向。科学理论具有把握大势、洞察未来的智慧和力量。“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宁波舟山港考察，回京后不久即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着眼全局的战略选择，成为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先手棋，深刻体现理论的前瞻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洞察时与势，把握危与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使自己更加心明眼亮，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推动各项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

——节选《人民日报》（2024年06月18日 第09版）

卷

首

语

JUAN SHOU YU

杂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杨继宏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东升 王平花

王桂贤 徐万廷

黄玉红 雷宁

主编：徐万廷

副主编：王平花

编辑部主任：孔晓

责任编辑：鲍淑红 金立叶

陈宝华 单娟娟

主办：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

中共固原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六盘山论坛》编辑部

电子邮箱：lpslt@126.com

印刷：固原萧关印刷有限公司

CONTENTS

目录

卷首语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P01 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丁威 李代奇

P08 念好“五字要诀”扭住“七个环节”
——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调查研究 陈静 胡遵远

理论探索

P12 第一份团刊《先驱》对社会思潮的引领研究
颜国军 梁静玲

P22 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上对于
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任海星

P28 邓小平同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贡献 王秀琴

P34 浅析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孔晓

萧关艺园

P38 萧关艺园

延安精神研究

P40 习近平对延安精神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传承与创新 金立叶

探索实践

P45 关于姚河塬遗址保护利用的对策建议 李荣

P48 关于固原市冷凉蔬菜提质增效的对策建议 苏冰洋

宁夏党史研究

P5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固原党的组织建设历程与成就
苏明珠

P56 从固原红军故事中汲取建设美丽新宁夏更为主动
的精神力量 刘杰

P62 《六盘山论坛》征稿启事

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丁 威 李代奇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思想不断解放和发展的历史。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彰显思想解放伟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思想解放在充分发挥其先导作用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关键词：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性飞跃无一不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思想解放，对于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思想解放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任务；邓小平同志认

为解放思想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1]，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2]，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定义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纵观党的领导人们对思想解放这一理念的阐释和践行，可以将思想解放的含义界定为：通过冲破人们头脑中的思想禁锢，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又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创新，达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主观能动性活动。

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以

思想解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时，不能不谈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尽管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这两次思想解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革新运动，是一次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解放，它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契机。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犯、军阀主义压迫和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共同催化下，爆发了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愧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知识分子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这次思想大解放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军阀专制统治的黑暗彻底暴露于社会公众眼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就在这时开始了它们的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干部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大地上不曾有过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思想解放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思想不断解放和发展的历史。思想解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其先进本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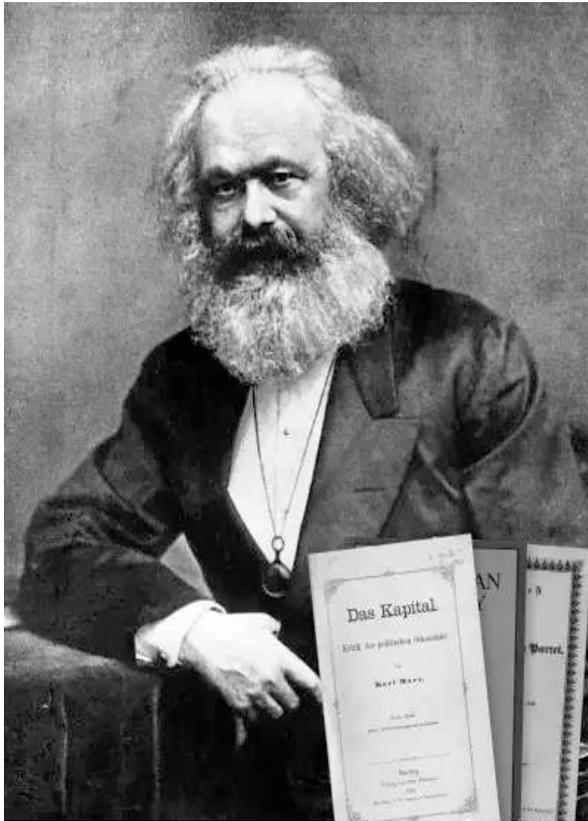
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一）党坚持思想解放，夯实革命胜利之思想基石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报告为开端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具有重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清”和“定”二字。

“清”，就是清算党内长时间存在的主观主义这一错误思想，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主观主义带来的危害主要就体现在其对党员干部思想上的荼毒上，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革命斗争陷入低潮。毛泽东同志曾经指明，主观主义是与实事求是相对抗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再次申明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厚植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以生发新的思想，“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与实际相联系”^[4]。于是乎，模糊观点得到明晰，错误思想得到纠正，原则问题得到解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全党得到确立。整风运动确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亦可以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

“定”，就是明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不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逐步形成优良进取的学风、团结和谐党风和科学生动的文风的基础上，全党明确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和人民的奋斗方向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思想方向，即以实事求是为精髓



的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体系。在对党的革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党的七大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全党同志在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的道路越走越敞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越走越宽广。

在“清”与“定”的统一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毛泽东同志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进行了回答：“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5]，他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箭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6]，强调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端正

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也是一场具有革命性色彩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党坚持思想解放，形成改革开放之理论先导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如何摆脱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阴霾、如何应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全党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任务主要就是“破”、“立”二字。

“破”，就是破除对“两个凡是”的神化思潮，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便在互相碰撞、互相吐纳中冲破了禁锢、获得了解放。同年9月，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公开批评，并申明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就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有力武器重新握在了手中，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晚年时期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

“立”，就是确立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响应人民心声号召的新路线、新方针。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了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重要性，即再一次肯定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一个党、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7]。因此，思想解放关系到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发展前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讲话，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以这次重要讲话作为大会的主题报告，它和正发展火热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同将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被确立起来，人们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迎来了新一轮的大解放。

在“破”与“立”的平衡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解放前提下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会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党的历史上实现了又一次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思想解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释、一国两制等等一系列的经典言论和科学践履无一不将思想解放不断推向高潮。思想解放之潮汹涌澎湃，社会改革之风也浩浩荡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于历史洪流之岸，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全力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重新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辟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在党内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对“第一个结合”的先行探索。践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第一个结合。实事求是，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凝练表达，是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形成的、中国人自己的方法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提到的那样，“‘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命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趋于完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如前所述，党的奋斗征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一条主线贯穿党的百年奋斗

史，可以说，是它带来了党的历史上的两次意义重大的思想解放。

（三）党坚持思想解放，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形态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每次面临重大历史关头的时刻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迈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新时代的思想解放就体现在“第二个结合”上。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个结合”破除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体用论”的思想禁锢，树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历史虚无主义是丧失文化自信的表现，它否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也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创造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当代人类文明持消极态度，同样也是一种丧失文化自信心的表现；“体用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割裂开来，没有客观地看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其中包含着褒西贬中的错误倾向。克服错误思想，必须树立高度文化自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第二个结合”是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把钥

匙。“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有机结合，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这种结合生发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文明，不仅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文化形态，也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新途径。

三、思想解放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是一个始终处于发展状态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个命题作出了中国回答：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本国思想文化发扬其包容性特点进而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0]。新时代思想解放要充分发挥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好“第二个结合”这一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钥匙，而且还要在这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守正创新。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发扬调查研究之

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对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经验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升华，为我们今天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成就提供了基本方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奋斗史。今天，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还要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2]，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洞悉客观情况，为思想解放提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再把经由实践检验后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把经由客观审视后的主观用以改造客观，这是进行思想解放的必经之途。新时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取得新成就，获得新发展，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发扬调查研究之风、弘扬伟大实事求是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

思想解放要守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正。“守正”中的思想解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是沐浴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党领导下的思想解放的性质和方向进行了规范和引导。进行思想解放所必须坚持的实事求是路线和“第二个结合”只有运行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轨道上才能发挥其正向价值，必须牢牢守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好伟大复兴历史任务，思想解放一旦超出了这个边界，就失去了其作为社会变革理论先导的意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因此受到损害。因此，新时代，思想解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来运行和调整，守好马克思主义之“正”。思想解放要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新”。要想真正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新”，需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正”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业绩、新成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创新”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思想解放之伟力，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理论成果，引领党和人民事业攀向新的高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新”。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与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解放是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战无不胜的重要保障，是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头活水，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立足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自觉，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第二个结合”赋予思想解放之意蕴，经由这种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担当文化新使命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新时代“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提供了中华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开出理论之花，结出实践之果。新时代，面对世界文化的交融激荡，必须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融合，以中国人民愈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自觉，愈加昂扬的奋斗精神和愈来愈强的历史创造能力，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人到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更奋楫。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面临着仍十分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更加需要发扬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宝贵精神和优良作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要为之武装全党、武装人民，在此基础上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在新时代的思想浪潮中激流勇进，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诗篇。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9.
-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7-39.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0.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0.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0.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5.

[10]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

[1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6.

[12]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N].人民日报，2023.3.20.

作者丁 威系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国经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作者李代奇系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金立叶

念好“五字要诀” 扭住“七个环节”

——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调查研究

◆ 陈 静 胡遵远

今年4月24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金寨调研指导工作8周年纪念日。值此特殊时刻，总书记亲民爱民、深入基层的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总书记深入花石乡大湾村陈泽平、汪能保、陈泽申等几个农户家嘘寒问暖，在农家小院与群众促膝谈心后，做出的有关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言犹在耳。8年来，全县上下时刻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扎实苦干、感恩奋进，如期实现了高质量脱贫摘帽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乡村振兴蓄势待发，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各项事业形势喜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推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是金寨县广大干部应该深入思考、作出响亮回答的一个紧迫问题。我们认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体察人民群众的情绪、感受人民群众的疾苦、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作出人民群众满意的科学决策，推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怎样做好调查研究工作？2003年2月2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头版新辟的“之江新语”专栏中，发表了题为《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的文章。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工夫。

在调查研究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他跑遍了所有的村；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他提倡“四下基层”到群众中去，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在浙江任省委书记，他跑遍了所有的县市区……他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总书记走遍祖国大江南北，深入车间码头、田间地头、市场社区、哨所舰艇、果园水库，强调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

真言、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

“深、实、细、准、效”，5个字通俗易懂、十分好记，是做好调研工作的真本领、大学问。作为县乡干部，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结合老区实际、联系金寨县情，我们认为：大家必须念好“五字要诀”、扭住“七个环节”，方能更好地深入基层、掌握实情、发现问题、把握规律、找到良策、促进发展。

一、立足“高”，提升思想认识。认识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必须充分认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此增强我们的自觉性、主动性。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无数事实都能证明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坚持先调研后决策，从调查研究中获得真知灼见，通过调查研究抓科学决策和贯彻落实，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着眼“精”，认真挑选课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具有前瞻性、目的性，必须提前准备、做

好“功课”，特别要精心挑选调研课题，不打无准备之仗。就现阶段金寨发展而言，笔者认为，县乡干部的调研工作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如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打好红色牌、推进大发展；如何把山水资源利用好、生态优势转化好、交通优势发挥好，加速融入“长三角”、牵手“大上海”；如何立足老区实际，做大产业经济；如何弘扬老区精神、大别山精神，进一步凝聚人心合力，加速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以此增强调研工作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现实意义。

三、突出“深”，坚持“身入”“心到”。1900多年前，东汉早期哲学家王充在《论衡·别通》中写道：“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故入道弥深，所见弥大。”他把涉水分成“浅水”“颇深”“尤甚”三个层次，得出“入道弥深，所见弥大”的结论。2016年7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广大新闻工作者分享了这段话，以此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我们这些县乡干部天天生活在基层、天天和群众打交道，还不够深入吗？实际上，“身入”不等于深入，只有“身入”+“心到”才能称得上深入，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到”。金寨县委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三三制”工作管理，确保广大县乡干部真正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本职工作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去开展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做招商引资工作。

四、注重“细”，做到细致入微。调查研究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必须看得仔细、问

出究竟，把事情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七下晋江，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下企业。有企业负责人回忆说，来公司调研的领导很多，习近平是第一个提出要看化验室的。2002年10月，在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在《福建日报》发表了万字长文，深入阐述“晋江经验”，文中就写到了这家企业。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寨大湾村详细察看农民的住房和陈设，了解贫困原因、贫困程度，通过《扶贫手册》看脱贫措施定了哪些、落实得怎么样。

真实的情况、深层次的问题，往往会被表象掩盖，只有细致入微，才能“入木三分”。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做调查，把当地各类物产产量、价格，各行业人员数量、比例等都弄得一清二楚。《寻乌调查》最终成为党的历史上调查研究的名篇。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庞大却细致入微，不仅摸清了苏维埃政权下的农村土地问题，探寻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正确方向，还详细调查了城镇尤其是城镇商业和手工业发展情况，为制定资产阶级及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2011年11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十分推崇这种作风。他强调，“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干事创业如此、调查研究亦如此。既要胸有全局、胸怀大局，又要落实落细、积微成著。

五、扭住“实”，严禁形式主义。调查研究不是做秀，而是要把工夫下到察实情、

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就习惯不打招呼，直接下乡、下厂、入户。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中办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了“四不两直”的要求，各级领导在开展调研工作时都要做到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大家，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调研，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指示多、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

六、深入“研”，提出科学对策。调研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实际、了解真情，发现问题、剖析原因，提出对策和建议；二是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总结经验、树立典型，推动和促进工作。要实现这两个目的，首先必须确保调研结果的真实可信。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要重视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少数人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他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经过多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进行的思考、作出的决策才能符合实际。

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阶段，我们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

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调查是了解“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研究是要回答“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研究这个环节，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做好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推敲，直至得出规律性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七、紧盯“效”，推进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在浙江任职期间，他赴丽水调研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时，发现很多农民由于家庭贫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文化素质不高，收入也不高。调研回来后，他就和省里商量，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免费的中专教育。“扶贫”先“扶智”，从问题关键抓起。他多次到下姜村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比如，老支书姜银祥提出“想请省里帮我们建沼气”。习近平当即肯定：“这个提议好！”几天后，省农村能源办公室便派专家入村进行指导。在种茶大户姜德明家开座谈会时，有人提出“缺人才”“缺技术”，习近平表态：“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不久，浙江省中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就进驻了下姜村。

调查研究是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习近平指出，对经过充分研究、比较成熟的调研成果，要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转化为具

体措施；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要更深入地听取意见，完善后再付诸实施；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整优化。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的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直奔问题而去，开展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着力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对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逐一列出解决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短期能够解决的，立行立改、马上就办；对一时难以解决、需要持续推进的，明确目标，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以及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要上下协同、整体推动解决，从而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的过程，成为新时代推进老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过

作者陈 静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金寨县委党校）讲师；

作者胡遵远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金寨县委党校）原副院长（校）长、安徽省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宝华

第一份团刊《先驱》对社会思潮的引领研究

◆ 颜国军 梁静玲

摘要：《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机关刊物，承担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以《先驱》为重要阵地，设立专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者形象，理性审视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把握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动向，以此来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其主要引领行为包括：严厉批评无政府主义，打破空想藩篱；猛烈抨击基尔特社会主义，否定改良道路；坚决抵制“好政府”主义，反对改革主张；辩证宣传非基督教思潮，坚持科学引领。

关键词：《先驱》 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

《先驱》在其《发刊词》中提出了明确的创刊目的：“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1]。基于此，《先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作为完成任务的武器，无政府主义、非基督教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好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成了《先驱》引领的对象。

一、引领之基：《先驱》引领社会思潮的现实可能

（一）早期进步报刊的办刊实践为《先驱》引领社会思潮奠定了基础。

1922年1月，临时团中央于北京创办《先驱》杂志，起初定为半月刊，后因系列原因，断断续续地刊发直到1923年8月，共25期。早在1922年之前，各类进步刊物早已纷

纷登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青年责任意识 and 思想解放运动等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提供了办刊的范例。《先驱》一出现，面对的已不再是严丝合缝的封建社会，已有部分民众正在觉醒，《先驱》要做的不再只是启蒙，而是“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

五四时期，最受瞩目的杂志当为《新青年》，引进多元思潮，产生理论碰撞。创刊初期，为了除旧，《新青年》欢迎各种新思潮，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国外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国门。从接纳各种思潮到主推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办刊重心的转变已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相比起初受尽吹捧的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是斗争出来的。

而《新青年》中各思潮的斗争史，既为马克思主义对其他社会思潮的引领史。

《新潮》杂志紧跟《新青年》，1919年1月于北京大学创刊，作为首个由学生创办的白话文杂志，其与《新青年》共同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意见领袖。“同《新青年》偏重于启蒙不同，《新潮》偏重于自知”^[2]。前者号召民众接受新观点，后者呼吁民众感悟新理论，曾被赞为“北大二新”。除以上二者，《觉悟》、《今生》、《湘江评论》、《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进步期刊共同塑造了“新青年”观念，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为《先驱》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二）革命先驱与进步青年为《先驱》引领社会思潮提供了人才基础

从1922年1月15日至2月15日，《先驱》发行了前三期文章，由北京地方团组织负责，主编为刘仁静与邓中夏。那时《先驱》并未有固定办公地点，刘邓两人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创办人，两人借用北大传达室，以此为刊物的收发传达之地；于1922年3月15日，《先驱》开始发行第四期，办公地点也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由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主编为施存统；从第8期开始，《先驱》的主编更换为蔡和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进一步负责。《先驱》从创办到停刊，虽短短25期，但得到了党中央与团中央的高度重视，其编辑部汇聚了一批优秀人才，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主编阵容。

《先驱》的撰稿人与投稿人多为早期革命先驱。陈独秀于《先驱》第9期，发表《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

警告》，陈独秀在文中明确表明了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他认为反对保守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抵制基督教是十分可笑的，但是“对于学生界非基督教运动，却十分赞同”^[3]。董必武于《先驱》第24期，发表《艺徒运动》与《农民运动》两篇文章，分别分析了艺徒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现状，并提出了切实的建议。除以上二者，李达、贺昌、恽代英和高君宇等人皆曾为《先驱》撰稿，在其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增强了《先驱》的知名度，使得《先驱》的发行量一度名列前茅，在社会思潮引领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二、引领之凭：《先驱》引领社会思潮的独特优势

（一）代表性——《先驱》半月刊是建团以来的第一份机关刊物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决定将《先驱》作为团的第一份机关报。在《先驱》刊发期间，团中央第二份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未面世，直到《先驱》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停刊，为了继续加强团的思想建设，《中国青年》才应运而生。因此，《先驱》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恢复和整顿青年团工作的首个刊物，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但也正因为太过耀眼，遭受到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与查禁，于1923年被迫停刊。

首先，《先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的首要窗口。《先驱》是最早译述《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的中国刊物，《提纲》是最先传播列宁关于殖民问题思考的文章，为中国共产党制定自己的民主

革命提纲提供了理论依据。《先驱》刊载的文章多为介绍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及其现状，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与俄国运动的情况。这为我国进步组织与进步青年吸收国际上的有益经验提供了知识渠道，为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做出了伟大贡献。

其次，《先驱》是提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首个刊物。近代以来，关于“解决中国问题方案”不断提出，未经验证时皆可有理，但如今回顾，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唯有一个。《先驱》于1922年4月1日刊发了《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一文，文中指出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步调，中国的阶级战争需要分为两段来完成，“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4]。《先驱》第22号《对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和第21号《民族解放》等文章，皆有深度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合理分析，指出了目前的任务是打垮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两个敌人，等到中国人民求得解放与独立时，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二) 不可或缺性——《先驱》发行期间，《新青年》休刊，《向导》还未发行

杂志时间	1921年7月至9月	1922年1月15日	1922年7月	1922年9月13日	1923年6月	1923年7月1日	1923年8月15日	1923年8月15日之后
《先驱》	未创刊	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停刊
《新青年》	党的理论刊物	停刊	一期	休刊	党的理论刊物			
《向导》	未创刊		党的机关刊物					
《前锋》	未创刊					党的理论刊物		

图1 《先驱》与其他刊物办刊时间对比^[5]

第一，《先驱》发行拥有时段优势，占领宣传主阵地。1922年7月至1923年6月，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新青年》处于休刊状态，除此之外，“工人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周刊》也由于各种原因纷纷停刊”^[6]，长期以来，《新青年》等期刊一直占领着舆论领地，指引着青年一辈的前行之路，而《新青年》休刊的始端恰好是《先驱》成为团刊的两月以后，《新青年》复刊不久，《先驱》就已停刊。因此，这一年来，《先驱》的发行量稳步上升，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向导》创刊于1922年9月，此时《先驱》已创刊半年有余，党中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将宣传重心寄托于《先驱》之上。因此，《先驱》不仅是团的宣传窗口，“它的一些文章，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的观点”^[7]。如《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于《先驱》全文转载，此文是党中央第一次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先驱》创刊早于正式建团，为团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准备。在五四进步思潮的作用下，1920年各地就纷纷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但由于各种思潮缠绕，各地团组织非但没有发展壮大，还日益松散，趋于解散。继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受党组织领导与少共国际的重托，青年团开始重组。于1922年5月15日，《先驱》刊发公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建团之前，《先驱》已刊载8期，从第5期开始，《先驱》的内容重心愈发转向团的建设。第5期《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刊发8篇文章，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国际青年运动与中国少年运动。例如,《万国青年共产党柏林会议之经过(一)》一文分别介绍了俄罗斯青年共产党、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德匈的青年工人团、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瑞典社会主义民主派的青年团等国家的青年团运转情况,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纯洁性——自我批评常态化为《先驱》的思想引领提供了有力保证

建团初期,团内培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先驱》作为团刊,刊发了大量关于自我批评的相关文章。1923年5月,团中央执委会第35次会议的态度于《先驱》公布,“《先驱》最近几期专以讨论本团的各种问题为主,同志中各种不同意见均可登载”^[8]。之后,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也多次在《先驱》上表明开展团内自动批评常态化的立场,“同志们!我们都是很幼稚的,我们都是在学习的:但我们须力求进步!我们须极力去发见(现)自己的错误,我们须大胆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须果断地去更改自己的错误!这样,我们的团体才有进步”^[9]。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与《先驱》内部的自我批评常态化开展,才得以保证团的良性发展与《先驱》对于社会思潮引领的正确性。

《先驱》主编连载《本团的问题》,多角度反思团内不足。1923年2月1日起,《先驱》开始连续刊载文章《本团的问题》,共5期。主编施存统于话题“本团的问题”展开论述,多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所在,涉及到团的性质、团的宣传、团员训

练、经费问题、团的组织问题、中央地方及团员的关系等问题。施存统在《先驱》上的连载篇幅并非将某个问题进行性质固定,他在结语中大胆地承认不足:“这篇文章在我的苦闷生活中断断续续地做成,有许多缺点,有许多谬误,那是不能免的,至于系统的欠缺理论的矛盾,恐怕更是当然的了。”他希望抛砖引玉,引起众人的关注,他在文末谈到,“只希望我们同志读了我这篇文章有多少反省和反应。如果能因我这篇文章引起一部分同志的根本的觉悟,那就是本团的大幸了,我当然也是私心窃喜的”^[10]。

三、引领之行:《先驱》引领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

《先驱》对于社会思潮的引领内容系统而具体,一是设置“研究”与“纪念”专栏,前者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具备很强的学术性。后者以纪念国内外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为主,树立马克思主义者形象,促发民众反思,踊跃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二是设置“言论”、“评论”和“批评”专栏,对其他社会思潮进行分析与点评,以此抵制错误思潮。

多个专栏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基本任务,以批评、抵制错误思潮为主要目标,合力达成《先驱》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之实。

(一)办刊宗旨明确,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基本任务

1.专栏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先驱》的“研究”专栏,主要设置在前3期,用以表达《先驱》的出场态度。《先

驱》第3期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后续》一文，以学术视角描述了《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历程，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场垫定了语境。《共产党宣言的后续》开篇提到，“这个宣言的寿命到如今已七五岁了（一八四七到一九二二）”^[1]，并且介绍了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三次变化，点出了《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这个宣言的命运也随着这些事变由盛而衰由衰而盛反映不停。”^[2]然后，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简洁的概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综言进化说和革命说，故其要点就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3]。除此之外，《先驱》还分期刊发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续文，从三方面去回应了各国论坛上对俄国新经济政策的质疑与攻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展开事实分析，逐一击破了攻击新经济政策的社会思潮。

2. 专栏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树立马克思主义者形象

德国共产党领袖李扑克内西（里布克奈西特）与卢森堡于1919年1月15日被害，两位先驱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毕生。《先驱》于领袖的第三年忌日时，刊发纪念专号，以催生革命青年的血性。《先驱》第一期的第五、六、七和八版为“里布克奈西特纪念号”，多版面、多文章、多图片的形式对两位先驱表达了敬意。自欧洲帝国主义的战争爆发以来，除却资本家的横征暴敛，不幸的是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忘了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大量的社会主义者为资本家所征服，只剩下李扑克西与卢森堡这样少数的赤色社会主义者继续坚

持真理，“他们的态度到欧战终了，始终未曾改变”^[4]。《先驱》是这样评价这两位先驱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行的乡（向）导并不是以他描写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而安慰精神的。他们深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他们又具有马克思实行的精神。所以他们于奴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将马克思主义救活了，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以及传播的迅速，这就是他们的成功”^[5]。《先驱》通过纪念号专栏的方式，于中国宣传李扑克西与卢森堡，不仅能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形象，更能引导社会青年去探究两位先驱的实践历程，从而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二）扎根中国土壤，形成了批判抵制与凝聚共识并举的思潮引领之路

《先驱》诞生于思潮混杂的年代，加之青年团成立初期思想并非凝聚统一，不同思潮皆怀有不同的政治目的，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先驱》设立“言论”与“评论”专栏，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基督教与世界改造》等文章，以引领社会思潮。

1. 严厉批评无政府主义，打破空想藩篱

无政府主义在欧洲风靡一时，甚至一度对第一国际运转造成了严重困扰。五四运动之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受尽追捧，收获了一大批追随者。从1917年至1923年，上海《劳动月刊》、广州《民风周刊》、北京《奋斗（旬刊）》、山西《革命潮》、四川《红潮》和厦门《先锋》等近百个刊物曾推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文章，泛滥一时。又因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终极目标

过于相似，导致许多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一时无法分清，甚至误入歧途。我党的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就曾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后由于李大钊同志与进步期刊的引导，才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无政府主义所构建的空想社会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为了与之对抗，《先驱》借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关文献，引经据典，逐一冲破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藩篱，并且适时表明拉拢态度，以共产主义引领无政府主义，一致对敌。

首先，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予以无政府主义严厉批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都是主张无国家和无政府，但两者的实践途径却有着天差地别。《先驱》创刊号文章《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指出，“马克思共产主义是给我们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步骤，手段方法，应有尽有，无政府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徒有美妙的终极理想，忽略了当前的实际事实”^[13]。可见，无政府主义构建的空想社会只能停留在脑海中，却无法实践成功。基于此，《先驱》做出总结，“无政府主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13]。最后，《先驱》认为“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对于此点解释尤为详明”^[13]，希望其读者阅读经典著作《列宁国家与革命》，以此更为详尽地去辨别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其次，表明团结态度，以共产主义引领无政府主义，一致对敌。《先驱》自发表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性文章之后，得到了“树敌太多”、“态度不太好”等回应，经过再三思考，刊登了《共产主义者所应采取的

态度》一文，用以团结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

“本来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如若无政府主义者能采取初步共产主义的手段，那末，不只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我们的一家子……所以我很希望无政府主义者——不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改变空想的，盲目的态度，同我们携手，一致对敌”^[14]。

《先驱》同其他进步期刊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引领颇有成效，经过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多次论战之后，无政府主义的形“左”实右的弊端逐渐暴露，促使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向马克思主义靠近。

2. 猛烈抨击基尔特社会主义，否定改良道路

基尔特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的身份被传入中国，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反对革命，拥护资本主义路线的改良主义，是抱有小资产阶级政治幻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先驱》就无产阶级立场多次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进行辩论，究其内容有两点，其一为社会主义是否需要革命，其二为唯物史观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否完全冲突。总之，共产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毫无让步之姿，但对于一时被基尔特社会主义所蒙蔽的青年持期望心态，希望他们及时意识到错误，走向正途。

第一，社会主义是需要革命的，而基尔特社会主义却在躲避革命。首先，《先驱》刊发了《革命与社会主义》一文进行作答，“社会主义是代替几千年以来的私有财产和阶级对抗的一种制度，但达到他需要打破旧习惯旧心理的新方法。倘若这一种制度，可

以不用方法，从天降下，社会现有的旧习惯旧心理不加改变，社会主义仍是行不通的。改造旧心理旧习惯的方法是什么？那只有革命的方法了”^[15]。革命不仅能够彻底地推翻旧有的制度，并且“还有一种好处就是他连带的训练了无产阶级”^[15]。相比于推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践踏社会主义，“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灵魂丢开了，只抱着无声无气的社会主义的躯壳”^[15]；接着，《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刊登于《先驱》的第三期，此文用作于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进行辩论，文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性质进行了高度的凝练，一“是非革命的”、二实质上是“是资本主义”和三“是不主张国家经营产业的”^[16]。并且，文章就以上三个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分析，猛烈地抨击了对方的改良之路，最后在文末表明了强硬的态度，希望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就以上三个方面做出回应，要求对方“要论点针锋相对，不要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不管我的话是如何说法，只是把你的说过了的话再重说一遍”^[16]。

第二，拒绝妥协态度，否认唯物史观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在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多次辩论中，基尔特社会主义由于其本质的虚伪性逐渐败下阵来。部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或者说部分为资本主义卖命的人士，试图以妥协的态度躲避马克思主义者的讨伐，换取继续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机会。一位笔名为六几君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安慰自己道，“何况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还非完全冲突呢”^[17]。但《先驱》坚决不同意此观点，刊登了《答六几和

东荪》一文，这样回答：

“但我要问六几君你是不懂得唯物史观呢？抑只听说有这个名称？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工团主义与修正派社会主义的调和。他的哲学——假定他有哲学——是完全偷窃伯因斯坦的……他们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因而大异……所以说唯物史观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完全冲突的，他只是盲而且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罢了”^[17]。

但是，《先驱》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追随青年并非完全抵制，特地在《共产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文中指出，“我们的唯一反对者就是专讲进化不讲革命的，冒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缓和阶级斗争以使资本家间接接收利益的人们……不过，在现在诱惑的世界中，青年一时受的迷惑，是可能的。所以一方面虽不喜欢他们，但一方面却希望他们启发良心，即叫向左转，受革命的洗礼，和我们同向光明道路上奋斗去”^[14]。

3. 坚决抵制“好政府”主义，反对改革主张

20世纪20年代，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迫切地想要改变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希望“贤人”组团，改组政府，以此改善政治环境，走上资产阶级改革之路，“好政府”主义应运而生。但“好政府”主义从其哲学基础上讲是主观唯心的，将希望寄托在“好人”之上，明显是行不通的。1922年5月，《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于《努力周报》第二期刊登，此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王宠惠等16人联名”^[18]，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共鸣。不过，《先驱》立场

坚定，坚称好政府主义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发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一文，用以纠正社会思潮主流走向。

第一，从运转原理上否定“好政府”主义。首先，“我们要知道政治上的好坏，乃是一种政治上的现象。我们不可拿政治现象的形容词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19]。因为，在民主政治下，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有好政府的同时也有坏政府。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也同样有好政府与坏政府，好坏政府只是对一个政府运转状况的评价，而非是改革奋斗的目标。其次，“我们要知道好政治与坏政治，不是几个好人或几个坏人弄成的”^[19]，而是一个派别乃至一个阶级的互相作用下导致的。“好政府”主义者将希望寄托在几个好人身上，未免太过主观唯心。以当时的中国政治情况而言，使中国政府及政治经济不堪重负的是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和曹汝霖等人，而拥护这些人的势力正是北洋派及封建军阀。那么，在北洋派和封建军阀的基础之上，几无可能建立一个“好政府”。“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者如果将改革的主张寄托在如此的势力之上，那么，他们“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19]！再次，无论是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法国政府，在“好政府”主义者的眼中称得上是一个好政府。但英法政府都是从革命的废墟上建立的，并非是通过呼唤的形式组建而成，基于此，拒绝革命的“好政府”主义注定是行不通的。

第二，从具体主张上批判“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的宣言上明确写着：“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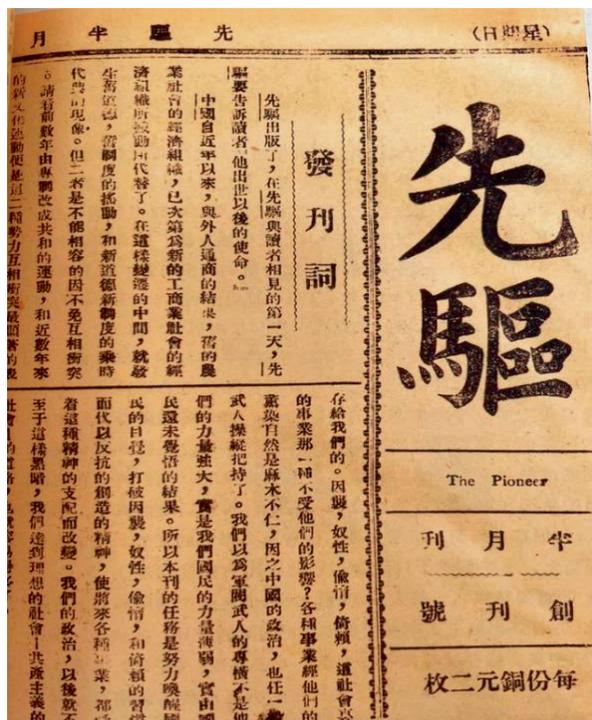
中的恶势力作战”^[19]。可是在“好政府”主义的宣言发表之后，由于黎元洪复位与万国会集会，恶势力仿佛逐渐壮大，“好政府”主义的具体主张第一条就转变了风口，“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19]。从支持武力到拒绝使用武力，可见，持“好政府”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惧怕革命的，是妥协，退步的。

在以胡适为首的“好”政府主张者认为社会的混乱是因为那些“好人”都“自恃清高”，以导致“有法治而无人治”的政府，即“好政府”所以不能构建。基于此，《先驱》严厉地批判了“好政府”主义者：“我们要明白告诉你们：你们这种太不努力太不决战的主张，在未实现之前，即已定了死刑。这不是别的不‘平心’不‘降格’的人定的，但（而）是‘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铁志’的北伐军队定的，换句话说，就是‘封建的’恶势力定的”^[19]。

4.辩证宣传非基督教思潮，坚持科学引领
非基督教思潮“以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为宗旨”^[18]，认为基督教不仅有违科学原则，而且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主张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基督教联系起来非基督教思潮的盛行，具体表现在当时报刊争相批判基督教的舆论宣传之上。《先驱》、《新青年》、《申报》和《大公报》等刊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基督教浪潮，推动着非基督教思潮不断高涨向前。

第一，揭露基督教的虚伪面具，否定其传教行为。《先驱》第四期为“非基督教学

生同盟号”，分为“宣言”、“公电”、“章程”、“言论”四个专栏。其中“言论”专栏刊登多篇文章，多角度分析基督教并予以精准抨击，推动了非基督教思潮的传播。首先，《基督教与世界改造》一文痛斥了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决（绝）不可忘记基督教杀人流血的历史：我们试图翻阅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便可以看见十字军杀人流血的手段……他们鼓励教徒们为荣誉拼命，自己却躲在礼拜堂里祈祷和平”^[20]！文中更是对基督教的实质操权人予以痛骂，“这班寄生的牧师和教士，自己一生吸饱了农工底（的）血汗还不够，还要背着好吃懒做的耶稣底（的）灵位来作恶，欺骗纯洁的青年们”^[20]；其次，《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一文揭露了资本主义利用教会的方式来吸食中国血肉的本质，“外国教士创办一个教会，必在本地罗致许多知识分子。我们要知道这便是资本主义帝国利用教会圈养知识分子做走狗的巧妙方法了”^[21]；然后，通过《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文，《先驱》表明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刊物的坚定态度：“一个人，他既信仰上帝而又自称为共产党员……那末（么）他已经停止他的党员资格了”^[22]。作为团刊的《先驱》不仅表明了青年团的态度，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当时，好比一记重拳打在了信仰不坚定者的身上，警告他们共产党是不允许具有丝毫妥协性的；最后，《先驱》通过《基督教与妇女》一文痛诉了基督教对于女性的贬低，文中指出，“基督教，在根本上把女子看做男子的附属品”^[23]。为了证明此观点，文中更是引用对方著作中的系列言语进行一一分析，从根本上



否定了基督教的传教行为。

第二，辩证对待非基督教思潮，正确看待教会学校。非基督教思潮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以反对帝国主义及西方基督教思想为宗旨。但随着非基督教思潮的不断高涨，科学逐渐失去了领导地位，“非基督教思潮的非理性化也逐渐抬头，反教人士的言论也日趋偏执”^[18]。对于非基督教思潮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先驱》并未置之不理，而是褒贬相加，理性评论。其中《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其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一文充分展现了《先驱》半月刊引领社会思潮时的理性态度。文章先是表达了《先驱》刊物对非基督教思潮的肯定，并就十个方面陈述了理由。接着，文章又发出了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并陈述了对于教会学校部分认可的原因，“教会学校办理虽不完善，而所以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的同情，是因为

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接近社会及纪律的卫生的训练这两点，实在比较中国私立学校的学生都好得多”^[1]。基督教虽是肮脏与血腥的，但并不代表基督教及其衍生物并无半点可取之处，辩证对待基督教思潮及其教会学校，摒弃糟粕，去粗取精，方为正确的社会思潮引领之道。

四、结语

《先驱》半月刊诞生于思潮纷繁年代，虽因经费缺乏、敌人打压导致最终停刊，但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菲贡献。

《先驱》刊登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引领性。其内容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不良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障碍，巩固了青年团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先驱》对于社会思潮引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驱》对于无政府主义采用批判与拉拢并举的态度；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坚决不退步，但对追随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青年持劝诫态度；对于“好政府”主义持否定态度；对于非基督教思潮总体上是支持的，但并不盲目，能够辩证地看待教会学校的优劣之处。

参考文献

- [1]发刊词[J].先驱.1922.1.
 [2]鹿晓畅.《新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3]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J].先驱.1922.9.
 [4]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J].先驱.1922.5.
 [5]吴昫潇.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

[D].复旦大学, 2013: 2.

- [6]张秀丽.《向导》周报的编辑出版与当代启示[J].新闻爱好者.2017.8.
 [7]魏宪朝.试析《先驱》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2.
 [8]光亮.本团的问题[J].先驱.1923.20.
 [9]存统.本团的问题[J].先驱.1923.16.
 [10]存统.本团的问题[J].先驱.1923.21.
 [11]励冰.共产党宣言的后续[J].先驱.1922.3.
 [12]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 [J].先驱.1922.1.
 [13]重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J].先驱.1922.1.
 [14]凯旋.共产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J].先驱, 1922.2.
 [15]仁任.革命与社会主义[J].先驱.1922.1.
 [16]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J].先驱.1922.3.
 [17]答六几和东荪[J].先驱.1922.6.
 [18]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21、398、402.
 [19]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J].先驱.1922.9.
 [20]赤光.基督教与世界改造[J].先驱.1922.4.
 [21]盧淑.基督教与资本主义[J].先驱.1922.4.
 [22]绮園.基督教与共产主义[J].先驱.1922.4.
 [23]哲华.基督教与妇女[J].先驱.1922.4.

作者颜国军系小平干部学院(广安市委党校)教师

作者梁静玲系广安市北辰小学二级教师

责任编辑:孔晓

论 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上对于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 任海星

摘 要：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就要搞清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就要解决好改革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协调的问题，就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经济社会关系整体相联系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仍有强大的思想活力。

关键词：邓小平 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实践活动的深刻总结，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的准确把握。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步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

马克思主义要求必须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在于对社会前进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及其发展属性的全面分析，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阐述了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形成以及社会制度的建立基本上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初始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体现着社会化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了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论述，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实践中的创新，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要求必须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传统体制的束缚和经济濒临崩溃的状况，党中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重大讨论和艰辛探索。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87年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

新时代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使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背景变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变化、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①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邓小平指出：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表明我们的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农村改革首先取得突破，实行“双包”责任制。安徽省委实行借地种粮、凤阳县小岗村农民采取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侧重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按劳分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精简行政机构；实行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来吸引外资，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改变了生产力

^①习近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2020年6月10日。



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状况。我国改革开放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进行探索为主线的社会变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不断调整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二阶段，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第三阶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我党对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伟大实践，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结合，表明了市场经济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把改革作为发展生产力的路径，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从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思想观念的束缚，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必须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路线图，这也是我党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坚定推进和切实贯

彻。全会《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增强社会活力，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释放生产力的能量，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体现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便一直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历经一百年的实践和探索，党的思想路线不断丰富完善、与时俱进。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探索的实践经验。在我党建立初期，中共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运用“实事求是”，但是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对“实事求是”的实践体现，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理论。毛泽东特别重视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实际状况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真正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②。新时代在推进伟大斗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思想上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③。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④。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③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20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④同上。

就离不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理论，说明了我党的指导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伟大实践。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坚持理论创新，这是符合中国当时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与中国当时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相符合的制度体系，是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理论，从而确保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能够落地生根、指导中国实际工作，更好地促进了国家的蓬勃与繁荣发展。

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步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

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各种场合不断阐述这一思想观点。随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1978——1988年成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最快最健康的十年。据统计，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乡及乡以上工业）由1978年的3938.05亿元增长至1988年的14960.27亿元，十年增长了279.89%。翻了近两番，年均增长14.3%，比十年翻一番所要求的7.2%的增幅高出7.1个百分点。在实践不断检验和丰富的基础上，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把社会主义重新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步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新时代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问题，改革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现代化理念和创新思维，把我国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和潜在活力充分释放出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人民正在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的，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砥砺前行，解决发展中的难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中国梦”是人民幸福的“梦”，在新时代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制定现阶段的发展政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中国梦”是国家富强的“梦”，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中国梦”是民族振兴的“梦”，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发展生产力来部署新时代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 [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5]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

教师

责任编辑：金立叶



邓小平同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贡献

◆ 王秀琴

摘 要：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植树造林、环境保护制度化建设、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环境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治理等方面的措施，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开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先河。其既是对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的丰富和发展，为新时代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 邓小平 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与贡献

一、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子孙后代。改革开放之初，森林面积约18亿亩，森林覆盖率仅12.5%^[1]。过低的森林覆盖率，严重影响了祖国山河的秀美，而且导致了水灾旱灾频繁、生物物种减少等严重的生态后果。为了尽快改善国土绿化状况，邓小平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2]。1982年，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早在1951年8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转发中共中央关于经营的指示中就提出：山区及林区的各级党委应把领导林业生产列为重要任务之一。要大力发动群众进行

护林、育林、造林工作，特别要防止森林火灾。上世纪50~80年代初，由于种种人为和自然原因，三北地区的植被遭到破坏，加快了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制约着这一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各族人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倡导下，党中央作出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重大决策，国务院批准了三北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并且制定了《国务院批转国家林业总局关于在三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规划》，开创我国大规模生态建设的先河。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北”工程建设高度重视，多次深入“三

北”工程区实地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8年，“三北”工程建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三北”工程建设是同我国改革开放一起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三北地区指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涉及全国13个省551个县（旗、区、市），占我国陆地面积的42.4%，分布着全国84%的沙化土地和八大沙漠、四大沙地，有7个强风蚀区、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是我国自然条件最恶劣、生态最脆弱的地区，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理难。三北防护林总体规划历经73年，三个阶段，共八期，现在已经进行到三阶段的第六期。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宏伟工程，不仅是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是全球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均超过美国的“罗斯福大草原林业工程”、前苏联的“斯大林改善大自然计划”和北非五国的“绿色坝工程”，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世界生态工程之最”。英国《泰晤士报》称赞这一规划构想宏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征服自然的壮举。

1987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奖章。在“三北工程”建设10周年之际，邓小平为“三北工程”写下了“绿色长城”的题词。经过40多年的不懈奋斗，“三北”工程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5.05%增长到13.84%，45%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得到初步治理，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4.5亿亩农田得到有效保护；“三北”工程带动林下经济、特色林果业、沙产业等发展壮大，为全国提供了1/4的干鲜果品，助力1500万人脱贫增收。在“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步入良性循环，荒漠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防沙治沙特别是“三北”等工程建设的决策是非常正确、极富远见的，我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二、环境保护制度化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邓小平同志曾经认为，制度建设是一场革命，要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把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的基础上而逐步完善的。1972年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审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周恩来总理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颁布了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制定了32字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1974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等，使环境管理有了定量指标。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了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还具体列出了十来个应该集中力量制定的重要法律，其中就包括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与绿化事业密切相关的法律。同时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单独的环境保护法的制定，以及在生态文明大范畴概念下的森林法、草原法的制定，在邓小平倡导和推动下驶上快车道。1979年9月13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法，标志着中国环境法体系开始建立。1982年宪法在第二十六条以专条明确“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环境保护被写入宪法。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确定环

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制定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和八项环境制度，颁布和实施的《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单项环保法律法规。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通过《环境保护法》，我国基本建立起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体系。初步规划出到本世纪末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指标、步骤和措施，推进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完成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生物安全法、环境保护税法等13部法律制订，制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赔偿、后果严惩等生态文明基础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针对生态文明建设基础性制度的不完善，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而且生态文明“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建立环境保护督察机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日趋完善。美丽中国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环境保护制度化建设，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

保障。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邓小平同志早就意识到人口增长过快会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困难，他根据人口同资源、环境的密切关系，主张积极控制人口增长。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时说：“现在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我们的人口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制定控制人口计划，争取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4]。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理论上阐述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过去有效地抑制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减缓了今天人口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稳定，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总量大幅上升，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1978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4亿人增长到9.6亿人，29年激增4.2亿人。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正如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强调的：“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

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5]。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6]。在当时人口增速较快的背景下，我国资源环境有限，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结合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质生产匮乏，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的现状，避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1978年将“国家提倡并推进计划生育”写入宪法，为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环境污染治理，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开始暴露、环境保护意识萌生、传播和普及时期。此时，工业化处于初级阶段，环境污染开始在局部地区暴露出来，污染事件陆续出现。邓小平同志借鉴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经验教训，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保护比较关注，尤其是对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重视。1978年9月访问朝鲜回国途中经过东北时，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指示，也多次谈到生态环境问题。1973年10月22日返京途中在河北邯郸作短暂停留，在峰峰矿区

彭城站看到水泥厂的烟尘很大，影响到附近陶瓷生产和居民生活时，当即指示：“这个问题你们要很好地研究解决一下。”1974年7月中旬，又和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批阅同意国家计委《关于研究解决天津市蓟运河污染等情况的报告》。8月26日上午，会见刚果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维塔尔·巴拉为团长的刚果友好代表团时说：“我们国家的污染问题没有欧洲、日本和美国那么严重，但也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污染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进行建设就要考虑处理废水、废气、废渣这三废。”1978年10月到1979年4月半年间，邓小平连续三次谈到桂林漓江的水污染问题，强调要下决心把它治好，造成漓江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他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也不例外。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五、水土保持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山区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水土保持，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告诫要注意水土保持。1962年邓小平同志谈到自留地时说，山地、平原开荒都要注意保护山林和防止水土流失。1964年4月16日，他同

有关人员谈三门峡水库上游治理问题时指出：“三门峡的治理方针是，上边拦泥，下边防洪排沙。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搞好治理了，可以多出商品粮。搞不好，就要出大问题”^[7]。196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汇报工作时，在汇报到水土流失治理情况时，邓小平说：“我看过陕西米脂县高西沟治理水土流失的电影，就是筑坝田、梯田，那里搞得很好，真是水平梯田，有水平。搞水土保持，就是要一条沟、一条沟地治。高西沟很好，是艰苦奋斗，大寨精神。水土保持，主要就是走高西沟的道路。水土保持，黄土高原种树，要搞一百年才行”^[8]。20世纪80年代，西北五省草木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可西北地区幅员辽阔，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近1/3。其中，面积达62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大部分处于这一地区。据考古发现，历史上黄土高原“森林繁茂，采集、狩猎及采伐林木都较便利”^[9]，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及人为破坏。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长期规划问题时，他把西北绿化问题作为西北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他指出：“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农村要鼓励种树。而且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10]。在邓小平看来，在生态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大量植树种草，才能打下经济发展的基础，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11]。

综上分析可知，我们党探索、开创和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植树造林、环境保护制度化建设、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环境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治理等方面的措施，既是对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的丰富和发展，也对后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使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奋力谱写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中国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3.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21.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6.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60.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63.

[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75.

[9] 桑广书.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4.

[1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16.

[1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68.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鲍淑红

浅析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 产生的历史条件

◆ 孔 晓

摘 要：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有一个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邓小平基于历史、现实和国际环境对党的建设理论进行了探索和发展，并最终形成了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

关键词：邓小平 党的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

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特定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正反两方面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立足新阶段现实需要，科学分析国际环境，在拨乱反正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总结党的建设的最新成果，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形成了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

一、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据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现实，无产阶级政党开启了执政的历史时代。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如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如何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一系列新课题摆在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面

前。“面对这些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并没有给现成的答案。列宁虽然最早对此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在执政环境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原则，但由于他去世过早，致使相关的探索未能充分展开”^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便对执政环境下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左”的失误，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了挫折，党的建设受到损害。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特别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果断地纠正“左”的错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提出了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

二、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产生的现实根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实现了“三个转变”。面临新时期出现的新的情况和问题，党的建设实践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个转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党的建设目标和指导方针必须作相应的转变。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党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的变化，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党的建设上形成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建党原则和理论。例如，在党的建设的目标上，要求把党建设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政治上制定了以进行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上，要求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必须围绕阶级斗争进行，各项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并且，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为了应对考验，关键时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政治路线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种适应阶级斗争需要的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方针就不仅不适应新任务的需要，而且成为新时期完成新的任务的障碍。因此，要完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必须顺应现实需要调整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针。

第二个转变是从僵化的体制、封闭的环境转变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要求不但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更要改善党的领导内容、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特别是受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结构简单、发展目标单一、建设规模较小的条件下，能够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生产规模扩大、发展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复杂，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难以适应了。它束缚人们的手脚，压抑人们的积极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要不断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都对党的领导的内容、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提出了挑战 and 新的要求，要求党必须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改变过去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党包揽代替一切的做法，改变过去由党委集体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建立起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执行统一高效，监督富有活力，既集中统一又互相制约的新型领导体制。

第三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党的自身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探索一条从严治党的新路子。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走的实际是一条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市场经济意味着经济主体多元化，多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共同竞争，自由发展。经济上的自主权和多元经济结构存在，必然要求进一步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党的建设必须考虑到多元经济发展的现实，以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的民主，用政治上的改革来保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又是利益多元化的经济，各经济单位都以经济效益和利润为目的。一方面，承认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竞争机制，可以激发人们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它对人们投机心理、个人主义的刺激。因此，必须坚持“两手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抵制消极腐败思想和行动在党内的蔓延，从而最大限度地利

用市场机制的积极方面。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它排斥特权，尊重法制，强调依法办事。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才能保证经济的有序发展。法律体系的建立，要求执政党有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在党内要消除权大于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废法的现象，全社会才能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风气。对执政党来说，就要建立起以制度建设为主的从严治党的监督和管理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使党的自身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使党的自身改革与社会改革相协调，并起到有力的引导和保证作用。

也就是说，“三大转变”的历史现实，要求我们党必须认真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党的建设问题，恰恰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

三、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产生的国际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争霸，两极格局形成。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党对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作了深入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并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

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这一重大判断表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谁认清了这一时代主题，谁把握住了这一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谁就能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就能走在时代前列。反之，则会丧失机遇，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永远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加快了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一跃成为世界新兴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能否抓住这一机遇，紧紧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制定出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针政策，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严峻考验。

为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必须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经济，就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最主要的责任。邓小平基于上述国际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巨大机遇，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并要求在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中要一以贯之地执行，进而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坚实的基础。

同时，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世界总体形势趋向缓和，但局部地区的矛盾冲突仍然此起彼伏，各大国之间的摩擦和利益争夺接连不断，世

界并不太平。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坚定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和剧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便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的首要目标。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党，必须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防止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腐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参考文献

- [1]张荣臣.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纲[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2: 186.
-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214.
-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43.
-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05.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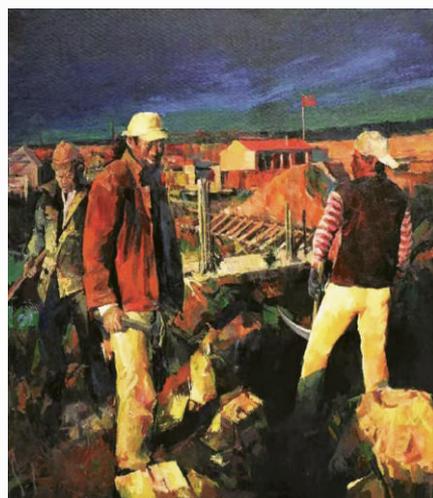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单娟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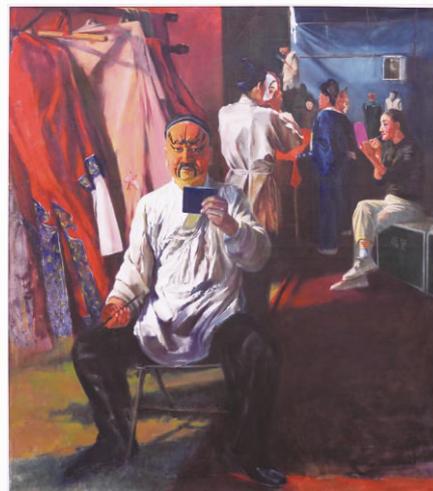
■ 《腌草》 / 康春明



■ 《春风》 / 李文斌



■ 《大时代之约望乡》 / 王雷鸣



■ 《秦腔之约》 / 李彦霞



■《宁夏乡村振兴漫记》/ 李彦辉



■《墨韵·家园》/ 李文成



■《厚土畅想曲》/ 马成功

习近平对延安精神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承与创新

◆ 金立叶

摘要：10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归根到底，就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始终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提出了新论断新要求，继承和发扬了我党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我党奋斗目标的“初心论”，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深刻论述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传承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习近平 为人民服务 传承创新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优势就是人民性，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一直贯穿于我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最早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此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对什么是党的宗旨、如何践行党的宗旨作了深入的思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和实践出发，

紧紧围绕党的宗旨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延安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经过长期努力奋斗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大力彰显人民立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维护人民利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

一、继承和发扬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优良传统，突出强调人民的创造主体地位。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界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也说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无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级最显著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最鲜明的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基础力量。

中国共产党执政70余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雄鸡一叫天下白”的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后“神州大地换新颜”的日新月异，中国开始实现从站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尽管党的方针政策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反映传统民本思想的古句并重申我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无论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重申了人民在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近平对我党宗旨的重要论述，为人民群众廓清了疑虑，为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历史证明，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治国理政，只有俯下身，虚心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才能凝聚民众智慧和力量，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获得了长期执政的最根本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新论断新要求，发扬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优良传统，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旨认识进入了新阶段。

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初心论”，突出强调人民的利益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党因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是党不断奋斗的动力之源，没有人民，党的一切工作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忠实发声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扎根延安13年，带领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13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又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心系人民福祉，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国际国内现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了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强调要为人民办实事，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新论断新要求强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形成了我党奋斗目标“初心论”的时代话语体系，其精神实质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到延安插队并工作生活了7年，7年时间让习近平和延安人民的心紧紧相连，对延安和延安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就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在讲，目的就是提醒全党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自我、迷失了方向。”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是检验一个政党纯洁与否的标准，初心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勇向前的动力之源。初心使命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讲：“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从梁家河到正定再到宁德，习近平总书记为民信仰始终不变，人民立场始终坚定。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了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继续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历史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真真切切站在人民的立场思考问题，并最终为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

三、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党宗旨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突出强调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

习近平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将为为人民服务思想体现在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当中，突出强调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执政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顺势形成的，这一思想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发展的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宗旨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对于实现我党长期执政、深化宗旨意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定

为党的奋斗目标。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进行了深刻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为应对风险挑战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之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丰富了我们党为民服务宗旨的内容和形式，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经过深刻总结后形成的，从为人民服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当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其中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四、赋予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新的使命，突出强调人民的评价主体地位。

从认识论视角看，人民是评价主体。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新论断新要求赋予了党员、干部新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

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和检验。

为人民服务是生动的实践，而不是一句简单空洞的口号，习近平特别强调人民是阅卷人，要坚持为民服务的群众观和群众路线，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政绩观、学习观，在新时代更要发挥领导干部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作为，使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不断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持久生命力的动力就是不断学习，“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学习中不断增强自身本领，从而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二）提高党性修养，努力为民谋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努力建立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队伍，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强化党的宗旨意识，不忘初心，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领导干部要做到知行合一，思想和行动始终以人民为根本，

努力提升党性修养，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正建立一支作风硬、能力强“为民、务实、清廉”的高素质领导队伍。要深刻认识到党员、干部是人民忠实的公仆，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引导、监督检查、纪律约束，才能保持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能力。

（三）开展群众工作更加高效。习近平的群众观是在与人民的长期深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在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深刻地认识到开展群众工作不能流于形式，要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刻感受群众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
教师

责任编辑：鲍淑红

关于姚河塬遗址保护利用的对策建议

◆ 李 荣

姚河塬遗址位于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是宁夏南部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西周遗址。姚河塬遗址的发现颠覆了学界“周人文化未过陇山”的论断，填补了西周历史研究和宁夏地方



史研究的空白。现通过调研发现姚河塬遗址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保护和传承固原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助推固原市生态旅游特色市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一、姚河塬遗址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遗址保护存在客观矛盾。随着固原市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姚河塬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是建设资金缺口巨

大。目前关于姚河塬遗址勘测、保护的資金主要来源于国家专项补助资金，地方配套资金投入不足，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尚未建立。二是建设用地保障存在困难。姚河塬遗址分布广、面积大，遗址保护建设用地需求量大。三是占地补偿问题突出。姚河塬遗址位于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其墓葬区、制铜作坊区等区域全部为集约化种植区，对于此处的勘测、保护以及后期遗址公园的建设，政府目前并未出台相应补偿标准，若未能充

分考虑到当地企业、农民的利益，就可能引发其不满和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征地工作顺利进行。

（二）遗址经济价值体现不高。姚河塬遗址的保护展示手段观众辨识率不高，无法全面阐释遗址的内涵价值，遗址本身位于乡村，远离市区，缺乏配套的设施，文物利用工作困难重重。挖掘工作自2017开展至今，虽已完成大部分文物本体修缮工程，但仍然作为单纯的文物资源相对独立，未将文物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教育资源和旅游资源，作为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统筹规划、科学利用。

（三）遗址保护基础设施不完善。姚河塬遗址已完成墓葬区文物的勘测，并已建棚保护，而制铜作坊区仅完成了文物勘测，建棚保护工作仍未完成，这对于建立制铜作坊展示保护区存在很大挑战，如游客随意走进遗址内任意踩踏、雨雪天气因素侵蚀等因素造成部分遗址区损坏。

（四）姚河塬西周文化形象输出不足。姚河塬西周遗址分别于2018年4月、2021年1月两度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和传播。一是宣传推广不足。当前的宣传和推广策略缺乏有针对性的文化形象塑造和品牌打造。二是文化内涵诠释不足。相关部门、单位对于姚河塬西周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缺乏深入研究和挖掘，这导致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难以形成鲜明、独特的文化标识，难以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兴趣。三是文化形象输出的方式和手段单一。在当今信息爆

炸的时代，传统的文字和图片介绍难以满足公众对于文化的需求。

二、姚河塬遗址保护利用的对策建议

对于姚河塬遗址公园的保护与利用，应做到在原真性保护的基础上，凸显遗址场所精神，尽可能多地融入固原市文化旅游资源，提升遗址的经济价值。

（一）扎实做好顶层设计，在部门联合上下功夫。建议固原市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文旅局等有关部门开展系统调研，推动城乡建设规划与遗址保护规划的衔接融合，解决遗址保护与城乡建设、居民生产生活协调发展问题，理顺遗址保护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矛盾，助力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是建立完善姚河塬遗址保护机制，充分利用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政策和资金，合理制定各级政府补偿经费分摊机制，探索社会参与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二是尽快明确遗址用地类别、管控措施。建议市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牵头，联系对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从省级层面赋予姚河塬遗址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规范性法定要求，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严格执行用地调整规划要求，破解公园建设用地难、建设周期长等问题，着实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三是探索遗址集中分布区补偿政策。建议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部牵头，研究制定文物工作补助补偿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确定补助对象、补偿范围等内容，将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列入支出范围。

(二) 聚焦经济价值体现, 在保护利用上下功夫。一是积极探索“文物考古+本体保护+遗址公园建设”的保护利用模式, 发挥姚河塬遗址对固原市旅游在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双核中的重要作用, 为建成固原市首个考古遗址公园提供文化着力点, 进而将历史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二是打造文化旅游圈。政府部门要持续重视文化旅游, 整合全市自然风光、特色文化、风景名胜等重要资源, 以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和西周文化传承创新区为目标, 打造西周文化以及民间民俗特色文化的旅游圈, 发挥文化旅游的优势,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三是开展系列考古公益性活动, 发展参与式公共考古, 向公众传播考古专业知识的同时发展原始聚落旅游, 体验野营、采摘、狩猎等游憩活动; 发展彩陶制作等公益性作坊, 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做好考古遗址公园的推广, 进而突出姚河塬遗址的经济价值。

(三)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政策落地上下功夫。一是建议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文旅局、市气象局等各部门发挥自身优势, 形成合力, 制定市、县级联合保护政策。二是在共同推动姚河塬遗址保护利用的同时, 建议对接自治区相关部门, 从省级层面出台专门针对遗址的政策, 为遗址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政策依据。三是建议政府更好落实主体责

任, 加强对姚河塬遗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在全面保护遗址文物本体的基础上, 积极保障遗址周边环境安全, 联合当地公安部门, 派遣专人轮流对遗址区进行巡逻保护, 在因人为因素破坏遗址区及遇重大自然灾害破坏遗址区等现象发生时, 及时做好预警防范工作。

(四) 注重文化内涵挖掘, 在文旅结合上下功夫。近年来, 全市各级旅游景点的游客数量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借助姚河塬考古遗址公园向公众普及西周文化, 对遗产保护和传承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国家级遗址公园开发, 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 对已完成勘测的墓葬区、制铜作坊区等运用数字技术恢复西周早期封国都邑(获国)城址全貌, 建立数字化展示厅, 提高游客体验感, 将姚河塬西周文化推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二是积极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西周文化学术研究, 举办学术会议和研讨会, 将姚河塬西周文化推向世界舞台。三是将姚河塬遗址作为历史教育基地, 与省内外学校合作开展历史教育活动, 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西周历史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作者系固原市第18期中青班学员

责任编辑: 孔 晓



关于固原市冷凉蔬菜 提质增效的对策建议

◆ 苏冰洋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指出“固原蔬菜品种很好、质量很好，要按照标准化种植生产，经得住检验，努力达到有机食品标准”。固原市委和政府将冷凉蔬菜确定为“五特”产业之一，全市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含复种），全产业链产值超过45亿元。但通过调研发现，全市冷凉蔬菜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现提出对策建议，以帮助冷凉蔬菜产业高效发展。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种植区域碎片化，规模化经营程度

低。全市冷凉蔬菜的种植区域和规模在总体布局上呈现碎片化，没有形成多个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基地。基本以小农种植为主，合作社、大户规模化种植程度较低。建设的育苗种植、分拣包装、精深加工、保鲜贮藏、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具有一定数量，但整体布局碎片化，作用发挥不够。

二是产品品质较低，生产标准化程度不高。全市冷凉蔬菜有芹菜、辣椒、菜心等万亩以上优势品种14种，大多属低品质、低效益产品。全市培育的蔬菜企业产品品牌多集

中在辣椒、芹菜、菜心、西兰花等低端蔬菜种植生产上。蔬菜种植只注重量的扩大而忽略了质的提升。部分引进的瓜果、蔬菜等对本地土壤污染和破坏较大。

三是销售渠道不畅，市场拓展不够。受市场影响，信息获取不对称，当地蔬菜大量成熟上市时滞销严重。销售渠道以商贩贩运、群众自卖为主，未形成以批发市场、运销大户为骨干的市场营销体系。入超、入市门槛高、成本高，净菜入超、大型餐饮直接供货等订单式采购量小，菜心、西兰花、甘蓝、娃娃菜等供港蔬菜单一旦量少。

四是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群众种植收益较低。种植者处于生产链条最初端，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群众获得的收益较低，作为贩运者低价购进、高价出售，中间赚取的差价相比种植者要高，这样就挫伤了群众种植的积极性。种植户受政策补贴影响，盲目扩大种植规模，选择的品种低端且种植、经营方式简单粗放，使蔬菜品质与市场需求脱节。

二、对策与建议

一是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形成规模化经营。合理布局种植区域，精准菜品布局要从全市统筹协调，形成统一高效的规模化种植、加工基地。引进龙头企业，培育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建立龙头带动、村社协同、股份合作、基地共建、社会化服务等联农带农机制，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推动蔬菜产业走集约化经营、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之路。

二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形成特色化种植。要适当稳住种植规模，逐步引导群众向

精而优、高端化方向发展冷凉蔬菜种植。鼓励县区发展一县一品特色种植。要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多培育种植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端品种蔬菜。加强农民种植、销售等多方面培训力度，实现线上线下双驱动培训与销售。同时要大力建设高效引水上山节灌设施，发展特色高山冷凉蔬菜。深入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实现蔬菜生产采摘、休闲体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发展模式。

三是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形成订单化种植。加大批发市场、营销体系建设，形成以批发市场为载体，收购营销点为基础，营销合作社为龙头，运销大户为骨干的营销体系。可以尝试以家庭为单位，开发适合家庭作坊作业的蔬菜进行精深加工。比如固原地区家家户户有腌制酸菜、咸菜的传统，可以尝试通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腌制酸菜，延伸产业链条。以文旅特色市建设为契机，将蔬菜向当地农家乐、饭店餐馆、消费者等错峰直销。

四是探索建立保价机制，形成保单化种植。探索建立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尝试在市场价格低迷时加大补贴力度，市场状况较好时，适当减少补贴。建立蔬菜价格浮动区间，随市场波动对蔬菜种植户进行补贴，减少群众的损失。同时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管，防止一些销售者随意抬高菜价，赚取过高利润，伤害本地蔬菜品牌信誉。

作者系固原市第18期中青班学员

责任编辑：陈宝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固原党的组织建设历程与成就

◆ 苏明珠

固原地处宁夏南部山区，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1926年秋冬，共产党员刘志丹、刘伯坚跟随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先后经过固原，沿途宣讲马克思主义，给固原民众留下了影响。1927年2月下旬，邓小平等人从苏联回国去西安从事党的工作，途经固原时宣讲共产主义。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以赫光、孙寿名、韩练成、陈良碧为代表的一些进步青年走出固原，寻求真理，投身革命。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靖远兵变和蒿店兵变，在固原境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1935年8月和10月，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固原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1936年6月红军西征，在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固北县委等党的组织。从1936年到1949年9月，在今固原地区境内先后建立过党的县委3个、区委组织4个、党支部26个，累计发展党员590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固原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历程

从1932年党在固原领导的蒿店兵变到1949年8月固原解放，党在固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经历了17年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

（一）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在固原地区初步建立基层组织（1932年4月—1937年6月）。土地革命前期，固原地区还没有党的活动。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先后在甘肃的靖远和固原的蒿店发动兵变，建立了两支红军游击队，分别在海原、固原境内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8月和10月，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固原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征红军在固原驻军活动期间，党在固原地区基层组织建设开始初步建立，主要有中共固北县委（1936年6月—1937年7月）中共固原县工委（三岔工委）（1936年10月—1937年6月）中共静宁县委（1936年9月—10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二) 抗战时期党在固原的组织发展艰难曲折(1937年7月—1945年8月)。1937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出动大批飞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不设防城市进行野蛮轰炸。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间,日军两次派出18架飞机,轰炸固原县城,投弹30余枚,炸死炸伤平民3人,炸塌民房10间,给群众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中共固原县委从1936年10月开始(三岔工委阶段)到1940年5月撤销,历时3年零6个月。在这期间,固原县委遵循上级党委指示,在建党和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尤其在同敌人进行反摩擦斗争中付出了代价,同时也锻炼了一批党员干部和党的基层组织,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初夏,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受陇东分区党委指示,在镇原马渠成立中共平东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平东工委由固原县委、新区工委、回民工委以及镇原县委管辖的南三镇、开边等党的地下组织4个单位组成。固原县委撤销后,固原地区未暴露的6个党支部由新成立的中共平东工委直接领导。1942年6月,平东工委撤销了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活动,工委机关由马渠移驻三岔,设在“天发祥”商店,以经商为掩护。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工委,朱敏任甘肃工委书记,平东工委受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双重领导。1945年年冬,李步瀛调到中央组织部,中共平东工委停止工作。

(三) 解放战争时期固原的党组织在斗

争中锻炼成长(1945年9月—1949年9月)。解放战争时期,固原除原有的6个地下党支部外,平东工委、镇固工委先后又建立了13个党支部。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固原东部地区共有地下党支部(含交通站)19个,累计发展地下党员529人;海原、隆德、化平、西吉4县共发展地下党员61人,因是单线联系,未建立党支部。全地区累计发展地下党员590人。

1946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甘肃工委先后三次组建海固工委。在海固工委成立之前和筹建期间,陇东地委、甘肃工委和平东工委曾多次派人到固原各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建立了各县地下党组织,他们在开展对敌斗争,尤其是发动群众抗兵、抗粮、抗款、分化瓦解敌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固原、化平、隆德、西吉、海原5县解放初期的县委和县人民政府(1949年8月—1949年9月)。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扶(风)郿(县)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与部署,兵分3路,形成了解放大西北的局势。中共中央西北局通知各地积极调配干部,随军接收和建立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遵照这一指示,陇东地委从各地抽调了七八百名干部,经过短期培训后,西北局组织部任命了一批科级干部,并按其来源编了3个随军工作团,随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和十九兵团(原属华北野战军序列)进入新解放的地区开展接收建政工作。1949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命令,化平、隆德、固原3县由平凉分区管辖,西

吉、海原2县由定西分区管辖。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固原党的组织建设主要成就

(一) 早期党的活动和红军长征的深远影响，为党在固原开展组织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开展了创建陕甘边游击队和陕甘边新苏区的革命斗争。1932年5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谢子长、焦维炽来到靖远，领导了“靖远兵变”。1932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和周志学在固原境内策划实施了“蒿店兵变”，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并在固原石家沟口等地转战中，沿途书写革命标语，宣传红军的主张。由于这两次暴动不仅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在陕甘的军事、政治统治，从思想上、组织上冲击、分化了西北地区的反革命军队，而且在海固地

区较早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主张，开启了固原地区早期党的革命活动，标志着固原历史上有领导、有组织、有规模的党的活动开始。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下，进入今宁夏西吉县单家集、兴隆镇地区，在固原境内活动、驻军5天。红二十五军在固原期间，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大力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及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和争取广大回族群众一起参加革命和斗争，培育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革命感情，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进入今固原市西吉县境，到10月9日下午离开彭阳县孟家塬，在固原地区历时五天四夜，留下了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壮丽词章和“不到长城



非好汉”的革命精神。六盘山因此被誉为“胜利之山”、“红色圣山”而名扬天下，成为了固原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固原是红军西征战役的主要战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这里开展得卓有成效，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歼灭国民党军7个营，击溃3个团又5个营，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占领城镇十余座，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10月22日、23日，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团结和巩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促成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西征等革命活动的广泛影响下，海固地区爆发的三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黑暗统治。西海固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也是1936年西征的主战场，与陕甘宁边区相毗邻。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县、固原县（今宁夏西吉、海原、原州区）的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接连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黑暗统治，唤醒了广大回族民众追求民族

解放的觉悟，揭开了西海固地区回、汉人民大规模反蒋斗争的序幕。失败后的回民起义军投奔边区，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组建成“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光明大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四）中共固北县委、静宁县委、固原县工委的建立及革命活动，为抗战时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巩固军事斗争成果和民主建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红军西征期间在同心、海原创建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我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我国后来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历史借鉴。在固原以北创建的中共固北县委，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陕甘宁区的西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固北县委建立后非常注重党政组织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这期间县委发动组织群众完成了适度的打土豪、分田地任务。针对敌人造谣煽动和破坏活动猖獗的情况，在各区、乡都成立了锄奸委员会，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保卫县域安全，发展抗日民主力量，为抗战时期民主建政工作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证。固北县委和固原县工委在开展工作中注重发展革命力量，在所辖区、乡和行政村中，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并组织轮训，为党培养了干部，壮大了

力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西征红军红三团在单家集协助成立的中共静宁县委及其下属的10个区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和35个乡苏维埃政府，积极配合红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军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巩固了牢靠的群众基础。红军军事行动展开后，中共静宁县委动员回汉群众筹集大批棉衣、布鞋、棉布、银元、羊只，犒军支前，组织20多名精干人员协助执勤放哨、当向导引路，派遣县游击队支援红三团袭击国民党静宁县城。红军在单家集一带活动时，有2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固原党的基层组织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分裂磨擦斗争中得到考验和锻炼，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时期，固原地域建立的各个基层组织（包括县委、苏维埃政府、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区乡苏维埃政府、党支部和交通站等）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他们注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固原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他们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人民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在调解民事纠纷、解决群众问题和促进社会民主建设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他们在反摩擦斗争中，同国民党针锋相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岢家堡子党支部在接送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打探收集传递情报和为边区采办急需物资等方面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麻子沟圪地下党支部在组织宣传抗日、帮助红军做地方工作、暗中秘密串联、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

款抗抓兵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组织和党员在完成工作和对敌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六）党在固原城市的革命活动推动了全民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此时，国共两党携手在固原东部广大农村热火朝天地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双方驻军和睦相处，两党地方政府官员来往频繁。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八路军一二九师专门设立了驻镇（原）、固（原）、平（凉）三县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其军队和地方上层官员共同抗日。1938年1月至3月，马青年主任和八路军西峰办事处工作人员，曾两次进抵固原县城开展统战工作，前后历时三个月，同国民党固原县政府进行过八次谈判。虽因对方无诚意致使设立八路军办事机构事宜未有结果，但来固的同志仍然不失时机地开展白区城市建党工作，在县城发展了孙存弘等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马青年带领随行人员四处活动，积极筹备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并大张旗鼓地宣传全民族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尽管国民党固原县政府以固原县抗敌后援会要由县党部筹办，群众不能随便成立为由解散了“固原县民众抗敌后援会”，但这次较有声势的抗日救亡活动，还是给广大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七）中共海固工委、中共镇固工委在固原地区开展对敌武装斗争、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海固工委第一次成立后，就承担起迎接中原突围部队359旅

的重任。海固工委和陇南特委及其所属武工队南下到化平县一带与国民党展开殊死战斗。第二次成立的海固工委，在固原、海原、西吉等地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工委与回民骑兵团合为一体，统一行动，以回骑团为依托，开展固原地区党的工作。第三次成立的海固工委，积极向固北、海原、西吉、化平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通过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宣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路线方针，并将毛泽东的指示油印成传单，散发给党员和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期间，海固工委与回民骑兵团移驻环县苦水掌，在车道区、毛井区开展游击活动，派出武工小分队，袭击了盘踞在寨科、小岔、罗洼的国民党自卫队。固东工作团成立以来活动于固原、环县、镇原3县交界地带，开辟了固原万安乡、王洼镇、大涝坝垦区一带白区工作。半年时间内，工作团深入国统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武装斗争，同国民党马鸿宾部队和地方民团进行了多次战斗，有力打击了边区附近的敌自卫队和乡镇长的嚣张气焰。中共镇固工委成立后，依靠原有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进步乡保人员，建立两面政权。

（八）固原各县地下党组织在发动群众抗兵、抗粮、抗款、分化瓦解敌人和迎接固

原解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海固工委成立之前和筹建期间，陇东地委、甘肃工委和平东工委曾多次派人到固原各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建立了各县地下党组织。他们在开展对敌斗争，尤其是发动群众抗兵、抗粮、抗款、分化瓦解敌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固原县红河党支部及岷家堡子地下交通站在秘密发展党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进步乡保人员、建立两面政权方，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地下党员陈添祥化装成货郎到隆德后，以山河镇李家沟（今属上梁乡）为立足点，开始秘密活动，发展地下党员。地下党员马有德、马兴魁在化平以白面河（今白面镇）为重点，扎根串连，物色发展革命对象，在贫雇农中首先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化平解放减少了阻力。地下党员车万宝到西吉后在什字路以摆摊做生意为掩护开展工作，组织群众，迎接解放。陇东地委统战部派李存仁接应段敏政到海原李旺一带开展工作。段敏政、李存仁在海原利用群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组织当地群众进行抗粮斗争。随着解放临近，各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同陇东地委派遣干部一道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作者系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金立叶

从固原红军故事中汲取建设美丽 新宁夏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 刘 杰

摘 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内在要求。结合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实际，本文从用好当地红色资源的角度，就深入挖掘研究与高质量讲好固原红军故事作粗浅探究。

关键词：固原 红军故事 汲取 精神力量

“红军长征在宁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1]。如何将这些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转化为建设美丽新宁夏更为主动的精神动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校（行政学院）的使命担当。深入挖掘研究与高质量讲好固原红军故事，对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而言，显得尤为必要。

一、要更为主动挖掘研究和高质量讲好固原红军故事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

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提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宁夏的三段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均谈到了宁夏的红色资源，包括1926年宁夏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转战宁夏并留下了“单家集夜话”、毛主席在《清平乐·六盘山》中抒发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和西征转战宁夏、1936年红军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等红色记忆、红色资源。并反复嘱托：“你们要

用这些红色资源教育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正是因为长征，众多六盘山下的放羊娃、普通百姓成为红军、成为英雄好汉；一些红军战士因病因伤流落固原，甚至在六盘山区安家落户，他们坚持战斗，宣传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老红军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六盘山区，奉献了他们毕生的心血……他们听党话、跟党走，抛头颅、洒热血，感党恩、献余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时至今日，他们的故事还在六盘山区广为流传，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固原红军故事。

中国共产党固原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革命先辈在固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

“红色”成为固原最厚重的发展历史、最鲜明的时代本色。未来，我们要把“红色”作为最鲜明的标识，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固原红色故事。

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尤须用好本地红色资源，讲好本地红色故事。唯有善用本地红色资源，引导党员干部学思践悟出其中的“理”、“信”、“德”、“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才能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因此，挖掘研究讲好固原红军故事，是落实领袖殷切嘱托的具体行动，是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现实需

要，是新时代加强党性教育的营养剂。

二、固原红军历史资料挖掘整理与研究利用存在“四不”短板

固原红色资源虽然丰富，但有关固原红军历史资料挖掘整理和学习宣传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一）底数不清

固原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查阅有关史料，应该不少。但通过走访固原市及各县（区）党史研究部门，却一直未得到准确的答案。

据1936年8月14日《彭德怀关于三个方面军准备在海原、固原地域会合等问题致李富春、萧劲光电》中指出：“野战军八月份在原地训练，深入地方赤化，九月初准备向前推进一步，主要目的扩地扩红。”《中国共产党彭阳历史第一卷（1921-1949）》有关红军追击军在彭阳的活动中明确记述：“在此期间，彭阳人民积极参加红军，根据1937年1月30日罗炳辉部一月整军简报记录，参加红二十八军80人、红三十二军60人”^[4]。

有的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数据有出入不完整。比如，在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西吉籍红军名录》中，记载的有名有姓的红军将士有21名，其中之一：“崔有财，1922年11月出生于甘肃省秦安县莲花城。”但不见马青年等的名字。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载：“凡是红二十五军走过的地方，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起革命的火焰。”“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时……马青年等十几名回族青年高高兴兴地参加了红军”^[5]。这与马青年在《忆红二十五

军长征过宁夏》一文中的相关记述相印证。

（二）挖掘不深

一是没有进行过普查征集活动。底数不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统一组织过全市范围以县（区）为单位的全面普查、身份认证工作，只有个别县根据实际做了一些工作。据走访了解的情况，有些原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参加红军，解放后回乡务农的老兵，其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确认统计。作为革命老区，有关长征和红军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举办过专门的史料、文物和红色故事征集活动。《西吉籍红军名录》中的21名红军，除解放后在固原工作过的马有德等个别老红军事迹较为清楚，其余的事迹鲜为人知，且没有被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固原历史 第一卷（1921—1949）》“附录5：固原革命历史人物”之中。

二是对重点人物的挖掘深度不够。例如隆德老红军李友禄，身经百战，曾荣获八一

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因伤病提前离休。在家乡生活的15年里，扶贫济困，深入学校、工厂和农村，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其事迹突出感人，至今被父老乡亲们津津乐道。五个子女都是共产党员，大儿子16岁参军当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其余四个子女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均考上大学，成为各自行业翘楚，其家庭、家教和家风堪称典范。长女、次女曾分别在江西省委宣传部和原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任要职，撰写有很多回忆父亲的文稿，由于挖掘不深，其子女们的回忆文章和百姓中流传的故事很难看到。

三是没有举办过专题研讨会。作为革命老区，迄今为止，没有举办过有关固原老红军历史专题研讨会。2016年9月21日至23日，“长征中的红军将士——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固原举行。红军后代和国内党史研究专家70余人参加研



讨会。谭政文将军之子谭斌在讲话中指出：“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应大力动员、组织社会人员参与。”“应使地方与民间的学术成果高效聚焦，尽快形成国家级的学术成果”^[6]。然而，参会人员中，没有一名固原老红军的后代，会后出版的《长征中的红军将士——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论文集》中，收录的60篇论文中也没有固原老红军后代的一篇文章。

（三）成果不丰

因为战争、经济文化落后等历史原因，有关固原红军将士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特别缺乏。现有的文献资料，主要有党史和地方志等部门主编的市志、县志、党史、革命史和一些红色书刊。如《固原史志》及各县区地方志、《中国共产党固原革命史》、《红色记忆 固原革命史资料文献》（上下册）、《中国共产党固原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中国共产党固原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中国共产党彭阳历史 第一卷（1921-1949）》、《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传略》等。这些文献，凝聚着党史方志工作者的心血，正规权威，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文献内容重复单调，缺少老红军子女、战友、同事和广大人民群众多角度的回忆文章；没有编辑出版专门故事集；没有专题研讨论文集；类似《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传略》、《百岁老红军谭德本的红色故事》（内部资料）等专人研究成果较少。

（四）宣传不力

据笔者在固原市第13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40份，回收35

份），不知道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创建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的有9人，占比26%；知道赫光但不知道原名的有7人，占比20%；不知道战斗英雄李友禄的有13人，占比37%；对于“您知道的固原老红军有多少位”的最多答案是6人。

三、抢救性挖掘整理与高质量讲好固原红军故事的建议

革命老区固原拥有丰富的、值得深入挖掘的红色资源“富矿”。深入挖掘、征集、整理有关固原老红军生活、成长、革命的历史背景、英雄事迹、文献资料，做好相关的原创研究、深化研究，时不我待，必须抓紧做实，才能为高质量讲好红色故事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支撑，才能更好地传递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红色基因，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斗精神，以昂扬的姿态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

（一）做好普查，摸清底数

根据调研掌握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所谓固原红军将士应该是广义的，应当包括土生土长的固原人参加红军的；在固原当地参加红军的；因病因伤流落固原的；原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参加红军的；解放后在固原长期工作、生活的等等。

建议由党史部门牵头，老干部局、民政、退伍军人事务局等部门通力合作，尽快在全市范围内以县（区）为单位开展一次全面普查，彻底搞清楚固原红军底数，这既是历史义务，更是历史责任。

（二）确定重点，深度挖掘

在普查的基础上，力争全面、系统、深

入弄清楚每一位固原籍老红军的基本历史，确定重点人物，明确主题，全方位、高水平深入挖掘其事迹的政治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

一要深度挖掘赫光、马青年、李友禄、谭德本、张元和（宁夏海原人，1936年6月参加西征红军，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朝鲜三级勋章、八一奖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六师副师长、师长，南昌警备区司令员等职）等老红军的革命历程、感人事迹与精神内涵。

二要重点挖掘戴高明（宁夏西吉人，1935年10月参加红军，1965年离休于甘肃平凉）、李云章（宁夏西吉人，1935年10月参加红军，1980年离休于甘肃兰州）、王正和（宁夏西吉人，1936年9月参加西征红军，1982年离休于北京）、王保志（宁夏西吉人，1936年9月参加红军，1983年离休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在外地工作、离休的老红军的事迹。

三要重点挖掘解放后在固原长期工作、生活的老红军的事迹，做好党史资料收集，特别是加强对革命文物和革命文献档案史料、口述资料、红色故事的征集。加强与离休在外地老红军亲属、所在地党史部门、革命事件亲历者、研究者、见证者的联系交流。

（三）整合力量，培养队伍

一要整合研究者队伍。要整合党史方志、党校高校、社科文旅、博物馆和中小学等部门专业研究资源，通过“请、选、聘、邀”等方式，组建以党史专家、党校教师、

红军后代、时代楷模、基层党务工作者、乡贤能人和志愿者等各层次人才组成的专兼结合的红色文化研究者队伍，通过学习、培训、研讨，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二要培养讲解员队伍。依托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加强与红色资源富集地党校、干部学院的学习交流，探索先进培训方法，编写专业培训教材，形成科学培训流程，培养全国一流现场教学专业师资队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队伍和干部群众讲解员队伍；结合乡村振兴、新型职业农民与乡村旅游培训，重点培养第一书记和百姓宣讲员，不断壮大宣讲者队伍。

（四）深入研究，丰富成果

一要编写出版固原红军系列故事和故事集。做好规划，按照确定的重点人物与重点题目，在深入挖掘、征集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版类似于《谭德本的红色故事》固原老红军系列红色故事，成熟一本出版一本，最终形成故事集。

二要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形成系列论文集。要结合长征与长征精神研究，邀请专家、学者、老红军后代等，举办固原老红军历史专题研讨会，教研咨一体化推进，形成更多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学术成果。

三要挖掘精神内涵，深化对“不到长城非好汉”革命精神的研究。通过对固原老红军理想信念、精神追求的深入挖掘，使历史与现实和未来有效衔接，深化“不到长城非好汉”革命精神的研究，并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动力，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五）讲好故事，深化宣传

一要开发红色教材，打造品牌课程。要选取固原老红军经典红色故事，进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党校、高校和中小学课堂，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力推进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模式，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二要走媒体融合之路，丰富红色文化宣讲的形式。将挖掘整理的固原老红军红色故事与融媒体相结合，积极运用新形式、新手段、新技术、新媒介，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以微电影、微视频、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

三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要以发展红色旅游带动绿色发展，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完善赫光纪念馆、老红军李友禄墓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研学基地、实景课堂，提升挖掘利用水平，让红色基因转化成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

参考文献

- [1][2]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11.
-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
- [4]彭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彭阳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54.
- [5]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63.
- [6]中国中共党史任务研究会等.长征中的红军将士——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论文集[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6.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孔晓



《六盘山论坛》征稿启事



《六盘山论坛》（季刊）是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 中共固原市委党校主办的连续性内部资料。主要栏目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理论探索、宁夏党史研究、延安精神研究、探索实践、宁夏史话、文艺作品赏析等。欢迎广大机关单位领导干部、各界专家学者、党校、干部学院同仁不吝赐稿。

一、来稿须知

- 1.题目：稿件题目应准确无误地表达论文的中心内容，20字以内为宜；
- 2.摘要：稿件正文前要有2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
- 3.关键词：稿件正文前要有3-5个中文关键词；
- 4.正文：稿件观点鲜明、数据可靠、文字精炼、结构严谨，篇幅以5000字左右为宜；
- 5.作者简介：每篇稿件都应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或职称、研究方向、通讯地址、邮编、联系方式、电子邮箱；
- 6.基金项目：请于稿件首页注明来源、名称及编号；
- 7.注释、参考文献：要核对准确，均采用尾注上标格式，序号分别为①②③……和[1][2][3]……

二、关于参考文献

-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研究报告格式：[序号]作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专著的文献类型标识为M，论文集的文献类型标识为C，学位论文的文献类型标识为D，研究报告的文献类型标识为R）；
- 2.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 3.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作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 4.论文集中析出文献格式：[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 5.电子文献格式：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三、关于编辑与采纳

- 1.本编印单位对来稿有删改权、作者若不同意，请在投稿中予以说明；
- 2.文责自负，切忌一稿多投、严禁抄袭、剽窃，否则由投稿作者承担全部后果；
- 3.稿件以电子邮件（word文本）形式发送至编辑部电子邮箱。审稿周期为一个月左右，文章一经采用，刊发后即赠样刊一本；自投稿之日起，如果三个月内未收到刊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四、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lpslt@126.com

投稿地址：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安康路2号

邮编：756000

联系电话：0954-2065708